如何才能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

□董学文

文艺批评有效性问题的解决，是个涉及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当然，概括起来似可说主要涉及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所谓主观方面，指的是批评主体的水准、素养和状态；所谓客观方面，指的则是文艺批评的社会环境、接受生态和评价标准等。文艺批评有效性的实现，是主客体双向互动的结果，单从个别视角入手或只注重某一两个环节，是难以奏效的。

市场经济、价值倾斜、取向多元、缺乏深度、风气浮躁，这些都给文艺批评活动带来明显负面的影响。但是，我以为当下民众和业界对文艺批评最为不满的，还是集中在批评主体这一方面，尤其是对于某些文艺批评的文风、做派和观念多有责备。要改变这种状况，亟需多方努力，做些扎实有效的工作。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关于批评建设工作，已有明确指示：要“培养高素质文艺评论队伍，开展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这一要求，既是对文艺批评家提出的殷切期望，也为解决文艺批评有效性问题指明了出路。

我们应当用《决定》的要求来反观文艺批评的状况：我们文艺批评家队伍的素质是否“高”到了合格的程度？现有的文艺批评是否开展得既“积极”又“健康”？优秀的作品褒奖的够不够？恶劣的作品贬斥得到位否？对有益的东西发扬光大得怎么样？对有害的东西阻遏清除得又如何？这一切都同文艺批评主体紧密联系着，同文艺批评的有效性也是紧密联系着的。要想切实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必须在上述问题上有所突破和改进。

这里，就如何才能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仅从批评主体的方面谈几点粗浅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其一，也许是最为紧要的，就是要使文艺批评具有诚实可信的精神，万不可做自欺欺人的事情。尽人皆知，文艺批评不是颁奖词，不是赞歌，不是广告，不是海报，不是谤书，不是私人悄悄话，也不是课堂讲义。严格说来，文艺批评活动并不纯属于个人行为，而是“理论共同体”或“批评家共同体”的集体事业。诚然，批评家会有自己的风格和个性，会有自己特殊而独到的阐释见解，但归根结蒂，每位批评家本质上都是代表一定群体、阶层、利益集团和观念倾向在言说、在阐述。没有担当，不去肩负思想、精神、文化责任的批评家，不会是好的批评家；不能正视自己，不敢在解剖裁判别人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也来番解剖裁判的批评家，也不会是好的批评家。批评家都是有自己的立足点和拿手武艺的。鲁迅说的不错：“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说自己没有“圈子”，那不过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9页）因之，批评家要想让人信任，就得诚实，就得旗帜鲜明、明码标价。倘若有谁把自己打扮成“共识”、“中性”或“普世”说的代言人，貌似“眼界开阔”、“公正公允”、“不偏不倚”，那其实正是犯了文艺批评的大忌，不仅在现今社会里没有，即使有也是假的。

其二，同上一条有关，那就是文艺批评务须准确和恰当，实事求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是文艺批评的生命力之所在，是提升文艺批评“人气”和“威信”的根本途径。我们有些批评，之所以不被大家看好看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批评家受种种因素的拘囿和束缚，丧失了说真话、讲实话的勇气和骨头，笔头一落到纸上，就知一味地说好，只会夸奖，不见批评。其结果是“文艺批评家”变成了“文艺表扬家”，缺少坦率交流、真挚对话，缺少鞭辟入里的评析和辩驳。这样的批评难以进入作者和读者心田，其效果也注定是要打折扣的。试想，“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无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他先就非被‘轻’不可的！”（《鲁迅全集》第6卷，第309页）诚然，有些批评文章也不是没写一点批评意见，但那只是在抽象的现象上提点儿小问题，很少或从不涉及具体的文艺作品；有些批评文章，笼统地讲些犀利的看法，可一旦联系到实际作品就支吾遮掩、隔靴搔痒；有些批评文章，喜欢在语言、结构、技巧、形式上兜圈子，而对于深层次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问题则置若罔闻、闭口不谈。这种美其名曰的“审美分析”，其实是不会触动任何人的心灵和神经的。我们反对乘一时之兴对文艺作品采取“棒杀”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反对于“嫩苗的地上驰马”，但也绝不赞成那种“举娼妇为英雄”，谄媚奉承、恭维夸大、不肯批评的“乡愿”式、“老好人”式庸俗作风。文艺批评家在揭示作者才华和成绩的同时，指出其创作的缺欠、局限甚至错误，做些“剜烂苹果的工作”，这两者是并不矛盾的。溢美难说是批评，惟有“爱而知其丑”，才显出批评的推心置腹和辩证公道。鲁迅不止一次地强调：“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鲁迅全集》第4卷，第528页）看来，这一见解于今日仍很有现实意义。文艺批评若是习惯于“绕着走”、“沿阻力最小路线走”，喜欢“钝刀子割肉”，擅长“今天天气，哈哈哈哈”，这种批评无异于是误导和堕落，要想产生有公信度的影响力恐是难的。

其三，要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就须得打破惯常的由“精英批评”、“学院批评”覆盖的局面，让更多的人参加进批评的活动中来。文艺批评的“有效”和“无效”，效果的“大小”和“好赖”，其判断和鉴别的主体只能是接受者，只能是人民群众。再加上当今媒体十分发达，公众发表意见的平台很多。所以，要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从另一个角度讲，就得增强批评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广度与深度，增强文艺批评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强调，人民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走文化发展的群众路线，决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性质。在讲到完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时，《决定》要求“把群众评价、专家评价和市场检验统一起来，形成科学的评价标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群众评价”是放在“专家评价”的前面的。这就说明了群众参与文艺批评活动的重要性。毫无疑问，没有群众的踊跃参与和积极投入，没有群众的悉心关注和内在热情，没有群众自觉地充当批评的主角，要想彻底解决当下文艺批评的有效性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性文艺批评有许多聪明才智和独到之处是专门家们所不具备的。他们语言生动，心口如一，“他们的是非爱憎，是比和事佬的评论家还要清楚的”（《鲁迅全集》第6卷，第348页）。为文艺批评增添新的能量和活力计，势必应该把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活动开展起来。

其四，或许是老生常谈，但又不能不说，即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须得让文艺批评的“争鸣”、“讨论”、“商榷”和“反批评”做法切实地得以执行。文艺批评的有效性是拒绝“冷冷清清”和“一言堂”的；文艺批评的有效性说到底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事情。因为事物是在比较中存在，在斗争中发展的。对文艺批评来说，真正的力量来自争鸣，真正的活跃来自争鸣，真正的功能也来自争鸣。听不见不同的声音，看不到相左的见解，死气沉沉，没有切磋，没有争论和交锋气氛，就是再有正确的意见出现，也会显得单薄、突兀、缺乏根基。“君子和而不同”。“争鸣”是发挥文艺批评潜能的最有效的方式。回避批评上的七嘴八舌、品头论足、众声喧哗，那是有害的。“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鲁迅全集》第5卷，第580页）有人把当下文艺批评的缺陷归纳为三点：“游戏化”、“作秀化”、“浅表化”。我以为大体是对的。既然如此，那就应当通过“批评”和“反批评”来认真加以解决。不愿或不能开展“争鸣”，随着“市场”、“人情”、“面子”或“利益”而漂浮，说穿了是把个人得失摆在了首位，将审美理想和追求真理当儿戏，缺乏坚定信念与高尚灵魂的表现。对于这种文艺批评，人们只会投以不屑、鄙视和轻蔑的目光。

文艺批评家确实有点儿像“医生”或“文物鉴定家”。谁都知道“医患”矛盾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好的医生，救死扶伤，仁心博爱，受人尊重。倘若医生瞎诊断，乱开处方，开假药，开贵药，那必定失去患者的信任。文物界据说有个说法：必先“鉴己”，方可“鉴宝”。眼下文物鉴定行乱象丛生、瘴气乌烟，除背后有唯利是图的商人做推手外，也与一些昧着道德良心、违反职业操守的“鉴宝”专家的行径不无关系。我相信，文艺批评家是会从“医患关系”和“鉴宝行业”的问题中引以为戒、获得教训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有更真切的批评，才会有更新的文艺和更新的批评产生的希望。我们要改变对文艺批评不够重视的状况，要创造形成开诚布公、有的放矢、科学说理、民主和谐的文艺批评环境，尤其是要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批评人才，即“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鲁迅全集》第4卷，第245页）。这样，我们的文艺批评就会赢得人民的欢迎。

如何增强文艺批评的有效性(10)

红学的迷失与红楼文化的危机

□张兴德

孙伟科在《文艺报》著文，提出了“热闹的红楼文化”“包含着深刻的危机”，“举步维艰”的红学，应该“成为文化创造力之学”。这在当前无疑是一个极为有意义的话题，但同时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研究的问题。

首先，如何全面、辩证、正确的评析当前红学和“红楼文化”的形势和状况，应该有个共识的标准和视角，这就是应从是否有利于正确宣传、传承、普及文化“国宝”《红楼梦》这个角度来探讨。红楼文化的产生和出现几乎是同《红楼梦》的流传同步的。最早的红楼诗词、红楼绘画、红楼曲艺等，其实是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用另一种艺术形式的解读和表达，它在《红楼梦》流传史上起着普及、宣传《红楼梦》的积极作用。红楼文化的危机是近几年的事情，它的出现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许多是商业的逐利的巨手在操控，例如所谓红楼餐饮之类。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红楼文化的发展、变异和危机，同红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红学通过不同途经在影响红楼文化。当前红楼文化包含的危机与红学的迷失有极大的关系。例如，令一些人着迷、甚至趋之若鹜的“揭密红楼”和“探轶”《红楼梦》后40回的“真故事”的兴起和走红，这已经不单单是红楼文化了，它已经是值得注意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人们对它关心的热度和广度已经超过了小说《红楼梦》本身。而作为一种“红楼揭密”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出现和形成，其源是受红学研究中的所谓“探轶学”的影响。而再追溯 这“探轶学”的产生，则是源于胡适当年的否定后40回。本来，程伟元、高鹗当年经过多方努力，使当年“无定本”“无完璧”的《红楼梦》，得以以120回本（就是后来被人们统称为“程本”的《红楼梦》）的面目流传。胡适否定后40回的这一做法，被他的继承者们加以放大并推向极致，在无确凿可靠证据的情况下，硬说程伟元是一介书商，程伟元出于商业的逐利，编造了《红楼梦》后40回成书的假话，高鹗则是受皇帝的旨意，窜改了前80回，就这样，后40回被彻底否定了，程本的前80回也被基本否定。而把来历不清、面目不明的脂砚斋的批语作为研究后40回的权威根据，于是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所谓“探轶学”。这本来是红学研究的一派观点。在红学界从来没有统一过。从学术研究角度说，就是再研究一千年也无可厚非。但是，奇怪的是这种情况到了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部以否定后40回为特征的1987年版的电视剧《红楼梦》，继之，强势媒体又大力讲述、宣传“揭密红楼梦”“红楼梦后40回的真故事”之类，这样，连中学生都知道《红楼梦》后40回是“伪续”。于是，原本属于红学界内部的“一家言”，便成为了一种社会的文化现象。其影响所及，不仅直接干扰了人们阅读《红楼梦》文本，它的直接和间接危害是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乐此不疲地跟着一些人去探寻这些“真故事”，而对《红楼梦》本身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含蓄蕴藉的艺术却少有（无暇）问津了。而且，由此还使人们产生一些猎奇心理，于是，各种“雷人”的学说纷起（例如有人要“拯救红楼梦”）。致使《红楼梦》研究出现了泛娱乐化、非文学作品化、非学术化和神秘化的怪现象，把本来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附加了种种“特异功能”。至于孙先生说的一些人在“没有一些可靠的文献根据”的情况下，自立学说，其实也源于当年否定后40回的胡适及其后一些追随者们的影响。他们在否定后40回，否定程伟元、高鹗的自序时，也是“没有一些可靠的文献根据”的。胡文彬在其新著《历史的光影——程伟元与〈红楼梦〉》一书中，以大量确凿可信的事实材料证明，程伟元不是一介书商，他出身书香门第，本人是有相当文化底蕴的文人。他对《红楼梦》一书的整理、出版是对当时即将流失的文化珍品《红楼梦》的抢救！对程伟元和“程本”《红楼梦》的否定实则是文化史上的一大冤案。此书此论在当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历史是最好的证人，历史又是一面镜子。《红楼梦》流传200余年来，泽被广远，它的“乳汁”，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诚如孙伟科所列举的鲁迅、茅盾、巴金等人。而这“乳汁”，并不是现代红学家们刻意论证的什么“红楼后40回的真故事”；也不是一些红学家乐此不疲地考证的曹雪芹的祖宗的祖宗；也不是来历不明、面目不清的脂砚斋究竟是谁和他的批语；也不是那个“更接近曹雪芹原著”的什么真、假本《红楼梦》的问题；更不是《红楼梦》背后映射的清宫秘史的“秦学”之类；这些一代文化大家，所接受和吸取的不过都是那个120回本《红楼梦》一书本身所体现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含蓄蕴藉的艺术及其高度结合的魅力。这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一切研究《红楼梦》的人们不应忽视的。

其实，哀叹红学“举步维艰”，这正是对红学研究的一种迷失。《红楼梦》作为一部文艺作品，其欣赏自然可以是多视角的、全方位的，正所谓“一百个读者心里可以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但是，红学史告诉我们：《红楼梦》引起的多起纷争，确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包括正确解读）《红楼梦》本身所体现的思想和艺术的问题。俞平伯先生晚年在他还很清醒的时候、在没有任何外界影响的情况下，认真地总结了他的红学研究，很负责任地自省说：“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烂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又说，“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

对俞平伯先生的这个认真的反思，红学界至今处于失语状态。还有，从胡适创立新红学到上个世纪50年代的批评俞平伯和70年代的全民“评红”，虽然从总体上已经有了结论。但是，遗留下来的许多理论问题尚需要重新研究和认识；有许多正本清源的工作需要去做；有许许多多的混乱认识需要厘清；“文革”的“左”的影响，还在或明或暗地影响我们对全书的思想内容以至于对人物思想形象的解读。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置这些大量的“选题”不顾，却哀叹“举步维艰”，不能不说这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迷失。

洞察

为社会主义文化添砖加瓦

——“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暨柯岩作品研讨会”综述

□高 昌

近日，由中国诗酒文化协会、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中国大众文艺学会、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暨柯岩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张岳崎、吉狄马加、刘润为、王一桃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作家和学者近百人出席会议。与会者从《讲话》的精神实质、当代价值，柯岩的创作与《讲话》精神的内在联系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会议认为，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的历史时刻，重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总结柯岩实践《讲话》精神的经验，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润为在发言中指出，70年前发表的《讲话》，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理论创造。它的创造性，它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第一次科学地完整地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人，不仅应当是文艺的主要表现对象，而且应当是文艺的主要服务对象。这是对数千年来被颠倒的历史的颠倒，这是与一切旧的文艺观进行的最为彻底的决裂。吉狄马加强调，《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局面的开始。70年来，《讲话》像炽热的火炬照亮了中国文艺前进的道路，像光明的灯塔指引着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面对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家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等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新的高度，这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现实意义上的又一个充分的证明。

与会者认为，70年来，在《讲话》精神的鼓舞、激励和指引下，一代又一代人民文艺家积极投身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从中汲取题材、主题和诗情画意，创造了无数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为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杰出的历史性的贡献，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柯岩是实践《讲话》的典范。刘润为说：“凡是读过柯岩作品的人都不难看出，她对于笔下的人物，从来不搞廉价的感情施舍，更不见牧师式的教诲，而是进行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零距离的沟通。”贺茂之说：“柯岩在刚走上文艺创作这个岗位时，有关领导就反复组织他们学习《讲话》，并以自己转变立足点的经历教育他们。她逐渐明确并坚定了‘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之理念和文学艺术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在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认真实践。这样才使她在多种形式、浩浩10卷本的创作中没有一首诗、一篇文是个人感情的浅吟低唱，而都是充满革命豪情的黄钟大吕；没有一篇是游戏人生或戏说今古，而篇篇都是人生正道或资治史实；没有一处是为自己涂脂抹粉，而处处都是为人民大众立言、立德、立功。概言之，没有一诗一文姑息放纵假、丑、恶，而诗诗文文俱是歌颂弘扬真、善、美。”卢燕娟认为：“柯岩作为人民艺术家，除了坚持艺术为人民服务之外，她对人民文艺更深刻也更独特的理解，是艺术要塑造人民，艺术家要承担为人民塑造心灵、为社会塑造良知、为民族塑造未来的使命。柯岩的意义，不是在某一种文学流派、语言风格上来说的。柯岩，也包括在人民文艺传统内坚持创作的几代人，他们的意义，最根本体现在《讲话》所开创的人民文艺传统中。这一传统是崭新的文化权力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的崛起，也是崭新的人在中国大地上的涌现。人民艺术家产生于这一传统中，不仅为之正名，更为之奋斗。因此，理解这样的艺术家，首先要理解《讲话》，理解《讲话》所开创的人民文艺传统对中国现代历史的深刻意义。”李云雷说：“柯岩是一位‘人民作家’。她的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人民的事业，她的写作是与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是她追求光明与未来的一种方式。在她这里，文学不再仅仅是游戏、消遣或娱乐，而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事业。作家不再是旧时代的戏子或文人，也不再追逐商业利益或者个人意义上的成名、成功，而是致力于社会与意识领域的改造，与一种更加宏伟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才配得上‘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

诗人石祥在发言中深情吟诵他自己创作的诗：“我是谁？在茫茫劳动人民的海洋里，我变成一滴辛勤的汗水，在五谷丰登的田野上，我是一枝成熟的谷穗。我是谁？哭着呼唤《周总理，你在哪里》，我是亿万人民眼中的一行热泪；笑着捧出《寻找回来的世界》，我是工读学校教师一片爱的心扉……”

很多与会者在发言中多次引用柯岩的名作《我是谁》。他们表示，学习柯岩同志，把从《讲话》开端的党的文艺主张转化为自觉采取的认识形式和情感形式，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鞠躬尽瘁、添砖加瓦，就是对于《讲话》的最好纪念。

广 告

本期看点：著名评论家阎纲记录女儿与绝症抗争的报告文学《美丽的夭亡》；刘庆邦描写保姆另类生活的短篇小说《走进别墅》；中篇小说《野猪林》精彩独特让专业作家想象力相形见绌，《研究研究再说》讲述官场故事透视人际的深不可测。著名作家张炜随笔十章《莱山之夜》展现作家人生艺术的最新思考与独特的理性光芒。

北京文学

·精彩阅读·2012年第五期要目

现实中国 美丽的夭亡——女儿病中的日日夜夜（报告文学）……阎 纲

作家人气榜

走进别墅（短篇小说）……刘庆邦

进入城市内部（创作谈）……刘庆邦

好看小说

野猪林（中篇小说）……罗尔豪

家乡有人真儿气（短篇小说）……冯俊科

研究研究再说（中篇小说）……雪 静

最后五十元（小小说）……林颖辉

新人自荐

回家过年（短篇小说）……汪赛良

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点评）……王秀云

文化观察 “中国新诗向何处去？”问题讨论之五……刘再复 谷 禾等

天下中文

莱山之夜（随笔十章）……张 炜

半野轩（散文）……吴硕贤

水生薄荷，清气悠远（散文）……子 川

真情写作

坝上记忆（散文）……张成起

我的老师“流水账”（散文）……李培禹

母亲！母亲！（组诗）……李群芳

去云上采摘爱情（组诗）……臧思佳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篇篇好看，期期精彩！请读者订阅2012年杂志，每期一百五十二页定价8.00元，全年十二期定价96.00元，可破季订阅。全国最实惠的原创文学月刊。如读者在当地买不到本刊，可汇款到我社发行部邮购，我社将免邮费。国内邮发代号：2-85。国外发行代号：M428。销售热线：010-66031108，66076061。地址：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

地火

2012年第一期（总第七十八期）要目

叙 事

逐鹿西部（中篇小说）……荆淑英

准备搬迁（中篇小说）……彭 康

石油流经的日子（中篇小说）……季 玲

流 韵

一座叫石油的城（组诗）……殷常青

石油的花朵（组诗）……刘惠生

勘探情怀（组诗）……于英太

江南行吟（组诗）……李光星

感 悟

上个世纪的爱情（散文）……邓 容

青春盛夏（散文）……王海艳

乡情（散文）……易 玲

订阅：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发行范围：国内外 邮发代号：82—549 邮编：100011

邮箱：dihuo2006@sina.com 定价：10.00元（季刊）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安华里二区甲3号508室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4—8510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3—1158/I

电话：010-64523173 64523170

清明

原创性、文学性、现实性

文学双月刊 二〇一二年第三期目录

长篇小说

战事……戈 舟

中篇小说

黑天使……林雪儿

之前之后……丁 力

知青记……徐 岩

范大旱的一天……谢燎原

水月庵……陈旭红

朝三暮四……陈克海

主 编：季 宇

副 主 编：舟扬帆

主 办：安徽省文联

社 址：合肥市芜湖路168号同济大厦

邮 编：230001

电 话：0551—2885559

邮发代号：26—30

全 年 价：60.00元

小说月报

2012年第五期目录

中篇小说

王五归来……王 松

介入……杨晓升

惊蛰……陈蔚文

仓皇的青春与爱……卢岚岚

短篇小说

寡妇的舞步……须一瓜

1937年的留声机……盛可以

白马路线……千夫长

夜空……（回族）马金莲

谁家有小孩呀赶快出来玩吧……宋长江

报刊小说选目